

陝西新出土古代璽印

伏海翔 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伏海翔 編

陝西新出土古代璽印

上海書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陝西新出土古代璽印／伏海翔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1

ISBN 7-80678-198-6

I. 陝… II. 伏… III. 古印(考古)—陝西省—圖集
IV. K877.6-6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125256號

陝西新出土古代璽印

作者／伏海翔編著

責任編輯／童辰翊 馮磊

裝幀設計／何孝永

技術編輯／毛志明

出版發行／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號 www.ewen.cc

印刷／上海天華印刷廠印刷

版次／二〇〇五年一月第一次出版

印次／二〇〇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張／15.25

印數／1-2500

ISBN 7-80678-198-6/J·111

定價／八十元

序

陝西出土古代印章概述

伏海翔

陝西位於黃河中游地區，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之一，歷史上曾有十多個封建王朝在這裏建都。自周秦以來一千多年的時間裏，陝西長期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中華文明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篇章。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地理條件，蘊藏着極為豐厚的古代遺存，陝西出土的歷代古璽印在全國各大博物館幾乎都有收藏，不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陝西出土的古代印章主要集中在關中地區和陝北地區，關中地區古墓櫨比，近年來由於西部大開發而大興土木，加之農田建設也非常活躍，從而出土了大量珍貴的古代印章；關中以北的黃土高原長年少雨，氣候乾旱，這無疑是大量古代印章得以保存的重要條件；陝北的延安、榆林一帶是古代邊戍之地，印章不僅作為將士身上的一個佩物，而且是驗證他們生前死後身份的一種憑信，所以，陝北地區出土秦漢古璽印也比較頻繁。

1980年在陝西扶風縣黃堆鄉雲塘村西周中晚期灰坑中發現了一組雙連印，一枚為三角形，另一枚為長方形，兩印之間用一繩狀銅條銜接，全印通高0.9厘米，通長6厘米，印體厚0.3厘米，印面紋飾簡潔，與青銅器上的回雲紋相似（見彩圖）。八十年代初期，周原博物館館長羅西章先生在扶風縣莊白村一西周灰坑中發現了一枚方形銅印，全印通高1厘米，邊長3.1×3.4厘米，印體厚0.3厘米，印面紋飾盤曲迂迴，似一鳳鳥形。這枚璽印與法門鎮齊家村二十七號墓出土的西周陶罐肩部圖案和一號窖址出土的瘡鐘、瘡壺的鳳鳥紋圖案極為相似，這兩枚璽印上的雲紋、鳳鳥紋均為西周時期典型的紋樣，可能含有某些圖騰或家族徽志的意味。^①如果說『安陽三璽』還在爭議的話，那麼這兩枚有準確出土地點的印章，給我們研究早期璽印的紋飾以及作用都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說：『季武子取卣，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又《呂氏春秋·適威》篇說：

『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擬之以方則方，擬之以圓則圓。』璽就是印，璽書就是用印章封發的官府文書，襄公二十九年係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20年），相當於春秋戰國的中葉了。根據文獻記載可知，璽印作為一種憑信，至少在春秋中期已經被廣泛使用。我們不妨先了解一下春秋戰國的歷史情況以及印章的作用。

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急劇轉變的時期，這時在政治、經濟上與西周相比都有着重大的變化，最為突出的就是西周宗法制度的瓦解。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生產力的提高，土地買賣的出現，私有土地迅速發展，土地兼井加劇，於是個體家庭代替了過去的宗族成為社會的基本經濟單位。由於經濟上的這種變化，也就必然相應地引起了西周時期以宗法制度為基礎的政治關係的改變，這種改變表現在西周王室的衰落，諸侯擺脫了對西周王室的依附地位，在諸侯國內便是公室卑弱，陪臣執命，這種變化在春秋戰國之交則更為加劇。隨着政治關係上的這種變化，在國家政權機構方面也改變了西周時期的組織形式。隨着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化，宗法關係的瓦解，階級關係也因之改變，周天子、諸侯、舊貴族都沒落了，新興的貴族、下層的士和平民階層代之而起。在政治制度方面廢除西周的氏族分封制度，國君把一切政治、軍事、經濟權利都掌握在自己手裏，逐步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國家機構。同時，由於這時參加國家機構的下層的士和平民，他們並不是因為和國君有親屬關係，而是以軍功或選拔而獲得的官職，因此便不像西周時期的貴族一樣，由於和國君的血緣關係，可以世襲官職。他們是隨時都可以任免和調動的官吏，在經濟收入上不是依靠自己領土上的貢賦而是領取國家的俸祿，這就是當時形成的官僚制度。由於政權的集中，官僚制度的形成，國君和臣下之間關係的變化，不再有血緣關係作為國君與臣下之間政治聯繫的基礎。因此，這時在國君授予臣下政治或軍事的權力時，就必須要有一種信物作為這種授予權力的憑證。這種憑證的信物，當時在軍事上就出現了用來調遣軍隊的兵符（即虎符），在政治上就是璽印了。當時國君任命官吏時，便授予璽印作為憑證，罷免官吏或官吏辭職時，必須把璽印收回。《韓非子》上有一段記載說：『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願請璽復以制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此外，像《呂氏春秋》、《戰國策》等書中都有辭官交回璽印的記載。

由於春秋戰國之間政治關係的巨大變化，印章最初便是作為政治權力憑證信物的需要而出現的，它是和兵符相輔為用，作為統治階級行使政治、軍事權力的工具。

戰國時的印章，我們通常稱之為古璽，這是緣於戰國時稱璽不稱印的緣故，戰國古璽分官璽、私璽兩大

類，印文分朱文和白文兩種，少見有朱白文相間者。戰國官璽較大，約為2.5至3厘米見方，個別大的有六七厘米見方，形制較為簡單，多是鼻鈕，白文璽印加有邊欄，朱文璽則邊欄厚重。內容有司馬、司工、司徒、丞等名稱，和先秦史籍上記載的一些官名相符合。戰國私璽較小，約1至2厘米大小，有的甚至更小。戰國璽印文字排列活潑、錯落有致，章法極為精美。除官、私璽外，還有吉語、動物、人物等等。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通行於齊、楚、燕、韓、趙、魏六國的文字，我們把它稱之為六國古文。六國文字既不同於甲骨文，又不同於秦統一文字以後的篆書，它與商周銅器上的銘文又有區別，它們各自與六國的陶器、貨幣、兵器、木簡上的文字較為接近。

楚係官璽多為白文，且印面較大，一般邊欄較為纖細，印文排布逼邊，大開大合，刀法渾厚，姿肆雄放，筆意明顯，與青銅器上的鑄文趣味相同。

齊係官璽有加邊欄和無邊欄者，無邊欄者多在印面上方加一小凸。齊係印文字體修長，排布交叉錯落，隨意性較大，一些字的筆畫還故意加長或省減，裝飾性較強，如『馬』、『璽』、『陳』等字地域性就比較明顯。齊係印章形制多見方形和圓形，但豎長方形和橫長方形的也不為少數。

燕國位於今河北、北京一帶，南與秦、三晉接壤。燕國官璽有正方形和長條形制，印文布擺整飭，結字獨立性較強，是與楚、齊、三晉、秦有着明顯的區別，朱文印綫條舒展，疏密對比強烈，蒼勁而不失靈動之氣，白文印綫條勻稱，方圓兼施，印面構圖虛實相映(圖001、圖002)。

春秋末年，韓、趙、魏三家卿大夫分晉，各立為國，在今山西、河南及河北西南一帶。三晉璽印多為朱文，且形制較小，文字筆畫細勁，鐵綫銀鈎，端莊典雅。三晉銅印中含有大量的錫鉛等元素成分，雖經二千多年，但光亮如新，賈市中將其稱為『白皮印』。三晉古璽多為鑄印，文字極精，但不易辨識，近年來陝西榆林一帶出土的三晉私印較多。如『私璽』(圖533)、『庫沽』(圖536)、『王暨』(圖539)等。

秦古文字是秦小篆體的鼻祖。秦璽文字與秦詔版、權量、貨幣上的文字極為相似，後人也較難區分先秦與統一秦的璽印。許雄志先生收藏有一枚符合印，陝西出土，印文風格與秦國古璽一致，當為戰國秦之物。這枚印章採用『兵符』一分為二的製做手法，分別為『王瘳』和『中壹』兩印，兩印既可單獨使用，亦可通過印體上的鉤孔合二為一，為『王瘳中壹』(見彩圖)。現藏陝西歷史博物館的『左中』朱文印(圖004)，也為戰國秦璽的一例。

帶鈎印也是印章形制的一個體係，帶鈎印源於何時，是當今印學研究一個不可忽視的課題。目前所見的帶

鈎印均在戰國秦漢之間，有文字和圖案兩種。戰國時期的帶鈎印一般採用鑄造，印文爲正字（一般印章爲了鈐蓋而製成反字），內容也從右向左多爲順讀。圖案印多飾以鳥獸肖形，如陝西旬陽縣出土的『虎』肖形帶鈎印（見彩圖）。秦代帶鈎印上的圖案又出現了人物、車馬等造型，姓名印多爲鑿刻，如『王阮』（圖615）、『姚歐』等。秦代在帶鈎上鑄刻人名的作法，也足以證明帶鈎印作爲印章的一種形制，已經被秦人接受，它如同印章的印鈕一樣，只是一種特別的形式。漢代帶鈎印的內容較秦代更爲豐富，但以圖案居多。西安張建強先生藏有一枚『神人操蛇』帶鈎印（見彩圖），『神人』（博國父）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蛇，有說此印圖案爲『禺疆』，但與『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②的『禺疆』不相符合。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命丞相李斯把和秦國不同的文字一律廢除，經過刪減，整齊劃一，製成了全國統一的文字——秦小篆體。秦始皇爲了提高中央專制政權的地位，並制定了一套新的典章制度，規定只有皇帝用的印才能稱『璽』（從那時起鈇字都作璽寫），官吏和百姓用印只能稱印。

秦代印章有的和西漢初期的印章不大容易區別，但仔細辨讀還是可以區分的。秦官印多作方形，白文印印面多加有『田』字格，私印多作豎長方形，也稱半通式。秦官印『酈丞』（圖025）半通印與西安北郊相家巷邨出土的秦代封泥『酈丞』（圖085）如同出一模。西安北郊相家巷邨新出土的秦封泥『祝印』、『車府』、『西鹽』、『泰行』等均爲半通式，由此看來，秦官印的形制不僅僅局限於某一種形式。除官私、吉語印外，還有一些用格言成語入印，如『相思得志』、『思言敬事』、『日敬毋治（怠）』、『忠仁思士』等，這一類印章一般都稱作閑文印。

1995年夏至1997年間，西安北郊相家巷邨陸續發現了總數約8000枚的秦代封泥，這批封泥分別收藏於古陶文明博物館、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日本篆刻美術館、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上海博物館等。其中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館藏的600余枚封泥品相最佳，品種最多，內容涉及秦代職官、地望、苑囿等多個層面，從這批封泥中的『麗山飢官』、『章廐』、『廢丘』、『廢丘丞印』等內容來看，這批封泥只能屬於秦代，它是和史書記載的相符合。『麗山飢官』即『酈山飢官』，《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二世元年『九月，葬始皇酈山』。酈山即秦始皇陵，『麗山飢官』乃酈山寢園的飢官，主管祭祀上飢的機構。這與近年在秦始皇陵西側內外城垣考古發現的『飢官』遺址和『麗山飢官』陶器刻辭也完全吻合。

這批封泥數量大、品種多，絕無僅有，爲我們研究秦代的歷史、地理、官職提供了重要的實物憑信。原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學勤先生稱之爲：『不亞於雲夢睡虎地秦簡的發現』，『是秦漢歷史、考古工作者

做夢都不敢想象的收穫』。原兵馬俑博物館館長袁仲一先生也感嘆說：『這是秦漢歷史學、考古以及中國古代職官、地理研究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極重發現，其中大量問題需要一代甚至幾代人的好好消化。』

這批封泥的文字由一字到多字不等，書體以秦小篆為主，像『中廐』、『西鹽』等文字書體仍存有戰國文字的遺韻，還有少量文字結構已具備漢繆篆的雛形。這批封泥的發現對我們研究秦代印章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憑證。

出土於秦兵馬俑底坑灰土中的『莊嬰齊印』（圖1162），印面1.7×1.7厘米，銅質，龜鈕。印文爲秦小篆體，『齊』字有戰國文字的遺風。根據這枚印章出土的灰層來看，這枚印章至少爲秦末之物，印文構圖未用田字界格。另有西安新出土秦代封泥『內官丞印』、『戲丞之印』等均未採用『田』字格的手法，這也就足以證明秦代官私印都不僅僅局限於加施邊欄和十字界格的程式。

西漢初一改秦鑿印的藝術手法，多採用鑄造。西漢初期的官印多承襲秦印風格，印文飾以『田』字界格，如：『高陵右尉』（圖012）、『琅鹽左丞』（圖014）等。但它們的文字從書法的角度講少了秦印那種柔媚，而多用方筆，結字方圓相濟，蒼勁有力，鈕制形式也比秦印豐富，有鼻鈕、瓦鈕、臺鈕、蛇鈕、魚鈕等。西漢鑄印布局嚴謹，平正方直，雖少了秦鑿印的活潑之趣，但形成了莊嚴典重、雄渾偉麗的藝術風格。

『皇后之璽』（見彩圖），邊長 2.8×2.8 厘米，白玉質，螭虎鈕，1968年咸陽市韓家灣狼家溝發現。出土地點踞漢高祖和呂后的長陵約1000米，後人推測『可能原為呂后便殿內供祭之物』、『被水衝到長陵山腰的水溝裏，隔了兩千多年方重新發現』^③，也有人認為『其上限不會早於文景時期，下限當在武帝前後』^④，并非呂后用印。我們姑且不論其是與否，但這枚『皇后之璽』的出土，驗證了《漢舊儀》中『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鈕』的記載并非傳說，也勾起了我們對皇帝六璽的奢望更多了一份遐想。

西漢末年，王莽篡奪了劉氏政權，把國號改爲『新』，我們把這一時期稱之爲『新莽』。新莽歷時較短（共二五年），這時期的官私印在形式上和西漢區別不大。由於新莽手工業比較發達，這時期所鑄造的官私印比西漢更爲精美，尤其在印鈕上就顯得更加精致生動，有的私印還采用鑲金、錯銀、鑲嵌等藝術手法加以藻飾，使形式美和內容美有機統一，把印章藝術的美推向極致。新莽在政治上標榜復古，其度量衡比西漢較爲短小，所以這一時期的官印都較小一些，約爲2.3厘米見方。

新莽官印在規定印文字數方面也有一定的改革。新莽規定，官印字數均不少於五字，凡不足五字的在官爵名稱後加『印』、『章』、『之印』、『之印章』等內容，多於五字者在官爵名稱後也輔『印』、『章』、『之印』、『之印章』等內容。

『之印』等內容。新莽規定，官印在文字布排上不得少於三行，凡五字或印文字數為單數者則將『印』、『章』這些助文字拉長，獨占一行，使印文佈排整齊勻稱，這在中國官印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如：『大河南尉章』（圖251）、『都尉之印章』（圖252）等。這種在官爵後輔以『印』、『章』等助文字的作法也并非新莽獨造，而在西漢末年已經不為少見，如『安夷將軍章』、『校尉之印章』等都是西漢之物。

『五威司命領軍』（圖208），銀質龜鈕，邊長2.4×2.4厘米，1983年陝西鳳翔縣柳林鎮屯頭邨出土。《漢書·王莽傳》載：始建國元年，『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這枚印章係首次發現，至今也未見與此印同文者。

東漢劉氏廢莽復祖以後，只是對西漢的官制進行了承襲，並沒有新的發展。東漢官印與曹魏時期的官印區別不大，一般只有從印文書體和官名上來進行辨別，現在可以考定的有上海博物館藏的『順陵園丞』、『陽陵令印』及故宮博物院藏的『征羌國丞』、『安平侯印章』等，為數不多。

『朔寧王太后璽』（圖206），金質龜鈕，邊長3.3×3.3厘米，1954年陝西省略陽縣陽平關出土。朔寧王，東漢初公孫述賜隗囂之號，取『欲其寧靜北邊也』^⑤之意。《後漢書·隗囂傳》載：隗囂，天水成紀人，字季孟。新莽之末，隗囂據隴西，自稱西周上將軍，初屬更始，旋附光武，後叛降公孫述。建武七年（31年），『述以囂為朔寧王，遣兵往來，為之援執。』此印應是公孫述頒發給隗囂之母的璽印。隗囂後來敗走安康，途經洛陽，其母或猝死於途中。

東漢對藩屬及部落，皆視為臣屬關係，所授官印皆在印文前冠以『漢』字，將軍印和頒發給兄弟民族的官印，多半臨時鑿刻而成，我們把這一類印章稱之為『急就印』。東漢末年，由於政府腐敗，一些權貴勢力割據一方，他們也在自己轄屬之內封官拜爵，製授官印，官印頒製混亂不堪。

東漢時期的私印多為鑄造而成，鈕制比以前更為豐富，印文除白文、朱文外，還多見有朱白相間者。這一時期又出現了套印，又稱母子印，有的在子印中又套一小印而成三套印。陝西大荔縣出土的『趙式印信』套印，兩組（圖1489、1490），印文內容完全相同，母印為闌邪鈕，造型精美，栩栩如生，印文曰『趙式印信』，子印亦為闌邪鈕，印文曰『趙式』，子印內又套一橋鈕小印，印文曰『文平』，兩印篆法變化在微妙之間，讓人回味無窮。1998年，陝西西安出土了『祝僕印信』套印（圖1488），鑲金蛙鈕，印體碩大，印鈕與印臺之間焊接痕跡明顯，印文奔放，氣韻廣袤，余意不盡。在二千年後的今天，我們觀賞把玩這些套印之餘，不論對先民的精湛技藝還是奇妙構思都無不叫絕。

東漢除官私文字印外，大量出現了人物、車馬、魚雁、鳥獸等肖形印，有的還假以龍、虎、鳳、龜四種動物來藻飾印面，這四種動物人們通常稱之為『四靈』（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從古代的瓦當和銅鏡上我們經常可以見到用這四種動物藻飾的圖案。漢人以四靈、嘉禾、醴泉為祥瑞之物，這也與漢人乘雲升天、長生無極、與美相志的神仙思想也是一致的。古鏡銘語『青龍白虎闢不祥，朱雀玄武順陰陽』也是漢人視死如生的思想寫照。

宗教印，又稱為法印，主要做為道、巫在施法時常用法具之一。法印的歷史源遠流長。清人吳騫《論印絕句》說：『秦時小璽，其文曰「疢疾除，永康休，萬壽寧」。』這段記載說明早在秦代就有了法印。王俅《嘯堂集古錄》記載：漢印中有『夏禹』之印，『係漢巫厭水灾法印』。但更多的是『黃神越章』一類的法印。如：天帝神師、黃神之印、黃神越章、黃神使者印章、天帝使者、天帝殺鬼之印等。『黃神』是指『天帝神』派遣的使者，主管生前爵祿與死後籍簿，其印可用於殺鬼驅邪。晉人葛洪在《抱朴子·登涉》篇中記載：『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其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也。』

1987年寶雞縣陽平鄉出土一枚『天帝使者』白文印（圖523），銅質龜鈕，屬東漢之物，也是陝西省現存最早的宗教印。東漢時期，由於黃老思想的盛行，人們對道教的三清神（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和真武大帝神（也稱玄天上帝，即北方七宿，以北斗為代表）倍加頂禮膜拜，這種崇尚在宋代已很是盛行。

陝西省漢中地區的西鄉縣、洋縣、南鄭縣、勉縣、略陽縣；寶雞地區的寶雞縣、岐山縣、寶雞市；西安地區的西安市、戶縣；渭南地區的韓城市；商洛地區的洛南縣、鎮安縣；榆林地區的神木縣、綏德縣等，曾出土有『北極驅邪院印』、『雷霆部司之印』、『北帝敕定統攝萬靈』、『九號仙都之印』、『閔』、『六甲六丁符印』、『道經師寶』等品類豐富的宗教印章。有的宗教印章是以北斗七星、三清符號作為變體而裝飾的文字，有的還以真武、雷公等造型為主圖，再穿插輔以文字，但都不易識。

宗教印章是中華民族宗教文化的派生物，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現，它作為天神的象徵，具有通神、護身闢邪、治病、驅神遣將等多種作用。宗教印章的大量出現是在宋元以後，明代以後才出現了『佛法僧寶』一類的佛教用印。宗教印章的出現，也給印藝之林增添了一個新的門類。『悟已往之不諫』（圖522），語出陶淵明《歸去來辭》：『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以謂使人覺悟。

魏晉印章沿襲了漢代的形式，在鑄造上却不及漢印精美。魏晉印章大都採用鑿法，筆畫較為纖細，文字章

法隨心所欲，雍容而不迫塞，拙稚又不荒野，別具寫意的趣味。魏、蜀、吳三國的官印，雖然同處一時，但還是有着各自的藝術風格。魏國的官印較為細勁，蜀國的官印較為粗獷，吳國的官印則以蒼樸見長，這也是緣於地域文化的不同和民族崇尚差異的區別。

魏晉頒發給少數民族的官印，前面都冠有魏晉的國號，這也是斷定時代最好的標識。在河北省景縣北魏封魔奴柩中，曾出土有三方官印：『冠軍將軍章』、『懷州刺史印』、『高城侯印』，同時出土的墓志銘上記載：魔奴卒於魏太和七年（483年），生前曾任給事中，『除使持節冠軍將軍、懷州刺史，進爵高城侯』。這三枚印章與職銜相符。這三枚印章印體碩大，龜體十分雄壯，四足站立，這也是北魏印章一個明顯的特徵。

1983年，在陝西寶雞市東郊古陳倉遺址一個漢魏廢井中清理出土了一枚雙面印，象牙質，邊長2.5×2.5厘米，厚1.2厘米，印文為『張穌印信』、『張穌言事』（圖1446）。此印篆法精美，印體較大，且為象牙質，那么這枚印的主人『張穌』又是何許人呢？魏晉史籍資料中均未有記載。《三國志·張郃傳》記載，張郃初屬韓馥，旋歸袁紹為中郎將。官渡大戰，投降曹操為偏將軍，封都亭侯。張郃曾兩次到過陳倉，第一次是建安二十一年三月（216年），隨曹操西征張魯，途經陳倉，只做了短時間調息；第二次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備夜燒圍鹿角。淵使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戰張郃，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淵遂戰死。』張郃敗走漢中以後，在陳倉曾做了休整，此時張郃屯兵時間較長，由於張郃兵敗，并致夏侯淵戰死，怕曹操降罪，誠惶誠恐，把自己佩帶的璽印弄丟在這裏也是有可能的。穌郃二字又是同音，若說此印是魏大將張郃之物也并不是沒有可能，《古璽印概論》一書中就專有一節，是關於出土古璽印更正史書記載中人名地名錯誤的例子^⑥。

『言事』意為言表於事，或為擬封上書言事專用之印。『言事』印前均冠以人名，如銅質獅鈕的『甘健言事』（圖1405），四川鹽亭東漢晚期崖墓中的『王表言事』。

『天元皇太后璽』（見彩圖），金質，獬豸鈕，通高4.7厘米，邊長4.5×4.5厘米，印鈕與印臺鉚嵌在一起，重802.56克。1993年陝西咸陽北周武帝孝陵出土，1996年咸陽公安渭城分局繳獲。『天元皇太后』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皇后，為北方突厥汗國可汗之女，姓阿史那。568年，阿史那氏被迎至長安，武帝驚羨其貌美出眾，更被她的禮儀有度而折服，遂廢原配皇后，封阿史那氏為武德皇后，母儀天下。579年，宇文邕之孫宇文衍即位，自稱天元皇帝，遂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隋開皇三年（583年），年僅32歲的傾國之色香消玉殞，因隋開國禮儀如舊，隋文帝楊堅又待阿史那氏與其家室有血親之緣，將她仍以國禮陪葬於北周武帝孝陵。

『天元皇太后璽』朱文印的出現，標志着北周官璽制度的改革，印體加大，棄陰文爲陽文，這也發端於印璽鈐蓋於絹帛的緣由。

1981年，陝西旬陽縣城東門外出土了一枚煤精石印，呈八棱十八面體，高4.5厘米，寬4.3厘米，十四面刻有文字，分別是『臣信上疏』、『臣信上章』、『臣信上表』、『臣信啓事』、『大司馬印』、『大都督印』、『刺史之印』、『柱國之印』、『信啓事』、『耶敕』、『令』、『密』等，書體爲正楷，魏碑風格。此印爲北周大司馬獨孤信之物（見彩圖）。《周書·獨孤信傳》記載，獨孤信爲鮮卑族，祖籍雲中，生於北魏景明四年（503年），本名如願。『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西魏大統六年（540年），任隴右十六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從此印的官爵內容來看，此印應在大統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之後才可能出現。《周書·孝閔紀》中記載，北周建國之初曾對獨孤信加官進爵，『遷太保、大宗伯、進封衛國公』。又據陝西咸陽出土的獨孤信與其長子的墓志中說：『……大象二年守楚安郡，大象三年秋，除儀同大將軍。』這些北周建國以後獨孤信享有的爵位均未在此印中出現，故此印應在大統十四年至北周六年之間。這枚多面體印上出現了人名、官職、封號、號令等多個內容，『印』、『章』、『上疏』、『上表』、『啓事』、『白箋』等助文詞也比較豐富，如此龐雜的內容集於一印，讓我們對這枚印章真正用途多了一份猜想。筆者認爲此印應屬獨孤信的清玩之物，原因有三：其一，此印形制爲多面體，印面尺寸較小，均在2.5厘米大小，這與西魏官印逐漸大的情況不符，官名與閑文於一體，也是與西魏官印制度相悖背的；其二，西魏官印從篆不從楷，當時官印多鈐於絹帛，且爲朱文，而此印却爲魏體正書；其三，印文中出現的『白書』、『白箋』、『啓事』等助文俗語與政府頒發官印的情況格格不入，政府根本也不可能一次把不同時期的官職、封號等頭銜授給某一個人。另外又從『臣信上表』、『獨孤信白書』、『信啓事』這些內容來看，此印具有一定的實用性，可作爲獨孤信上書言事以及書信往來的印鑒使用，這些閑文內容的出現，也對我們研究元明清流派印的源溯提供了一個新鮮的實物依據。

隋朝建立以後，雖然在政治經濟方面進行了改革，但在禮儀、官印制度方面還是因襲了北周的制度。《隋書·禮儀志》中記載：『金章龜鈕，宋孝建故事亦謂之璽，今文曰『印』，又并歸於官府，身不自佩，例以銅易之。』也就是說隋朝官吏不必佩印，印章已交由官府保管了。從目前發現的隋代官印來看，一般都在五六厘米見方，也就足以證明南北朝時期官印逐漸加大的情況，在隋代已完全確定了。

隋代印文棄漢繆篆之制，又復歸秦小篆之法，但不如小篆那樣規整，構圖隨意性較大。隋代出現了采用蟠條焊接製作官印的藝術手法，是用條狀銅絲，根據印文的筆畫盤曲環繞，分主筆和支筆，穿插點截，焊接在已

經製作好的印模上，有的文字筆畫幾乎用一根綫條代替，但製成後那種鐵綫銀鈎的筆意，動中有靜，拙中蘊巧，形成了清雅而寫意的藝術風格，也給篆刻藝術的發展傳來了新的信息。如咸陽出土的『右武衛右十八車騎印』（圖421）。隋代官印開始在印背上鑿有年號款，因此在時代上容易確定。

唐承隋制，印章發展變化不大，但這一時期墓葬明品中又出現了瓦印。瓦印又稱陶印，瓦印的製作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將磚瓦經過打磨，然後在上面鏤刻上文字，如『乾封縣之印』（見彩圖）；另一種是在泥坯上先進行鏤刻，然後燒製而成，如『雲陽縣印』（見彩圖）。瓦印雖不及銅印那樣精美，但其古陶留下的斑駁，尤顯蒼樸厚拙，別具一番趣味。

武周時武則天因『璽』與『死』音近，遂廢『璽』為『寶』，皇上用印稱『用寶』，這種稱謂一直延用到清代。

自從《貞松堂集古遺文》裏著錄『靈丘烙馬』四字朱文印出現以後，人們才撩開了古代烙馬印的神秘面紗。烙馬印是烙在馬身上用以作為屬有權標識的印記。馬是人類最早馴服的動物之一，馬匹數量多少、良駑好壞，也是一個國家農工業是否發達、軍事實力強弱的重要標志，《北史·魏本紀第三》中說：延興二年（472年）『五月丁巳，詔軍警給璽印傳符，次給馬印。』在《唐六典》中更有較詳細的描述：『凡在牧之馬皆印，印右膊以年辰，尾側以監名。』現藏於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博物館的『汗赭』烙馬印（見彩圖），鐵質，此印形制較大，應為唐代之物，如此巨大的鐵印，在古印中也極為罕見。與烙馬印同類的還有烙木、烙漆印，如陝西鳳翔縣出土的『樊氏』（見彩圖）等。目前所有最早的烙馬印是戰國燕璽『日庚都萃車馬』。

宋朝建國政權穩定以後，乾德三年（965年），官印以舊換新，『太祖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印、三司使印』，『自是，臺、省、寺監及開封府、興元尹印，悉令祝溫柔重改鑄焉』^⑦。南宋初期由於遷都流徙，官印散失較多，政府重鑄新印，在印文上加『行在』二字或刻年號以別新舊。『南渡之後，有司印記多亡失，彼遺此得各自收用，尚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然欺偽猶未能革。乾道二年（1166年），禮部請郡縣假借印記者悉毀而更鑄』^⑧。宋代官印以篆書為主，筆畫有增無減，彎曲重疊，充盈印面，形成了宋代官印特有的書體——九疊篆。

宋代書家為皇帝禦璽篆文的現象也十分活躍，有宋一代，已知為禦璽（包括皇后、太子等）篆印書家大臣就有王曾、陳堯佐、晏殊、歐陽修等近二十人之多，這也說明宋朝皇室非常重視禦璽的藝術性，這無疑也推進了宋代印章藝術的多元化發展。試想，這些名士們在為皇帝篆印之餘，為何不為自己篆印呢？也不難想象，會有

一大批好驚之士請這些曾為皇室篆印的人給他們篆印，附庸風雅，并以此作為時尚。由此看來，宋代文人印的興起也并非偶然。

1032年，黨項羌族在寧夏、甘肅、陝北、山西一帶創建了西夏王朝，夏景宗李元昊親自主持創建了仿照漢字的西夏『國書』西夏文，共六千餘字。西夏文多用會意、形聲造字，幾乎吸收了漢字的所有筆畫，但沒有套用一個現成的漢字，西夏文字體方整，筆畫繁雜。

西夏官印筆畫盤曲彎折，佈滿印面，這種與宋官印『九疊文』相似的書體，是為西夏文篆書，如西夏文『首領』印(圖435、436)。西夏官印幾乎全為白文，線條粗獷流暢，印面加有圓角邊欄，印背有西夏國書鑿款，這也是西夏官印一個明顯的特徵。西夏私印傳世極少，與官印正好相反，均為朱文，且以西夏文國書入印，形制有方形、圓形等(如圖515)，有的還不加邊欄，印面構圖空靈，印文筆畫清新，比漢楷更為生動。從西夏官私印的書體、朱白、印章形式等多方面綜合來看，西夏王朝對官私印的頒制有着明確的規定。

從科學考古發掘以及歷史文獻來看，金代官印在使用製造上前期與後期有所不同，這是由於政治形勢發生變化的緣故。據史書記載：正隆初年的官印，有的用遼金舊字及契丹文字，正隆元年始令禮部重鑄頒發。金代初年由於戰亂，朝廷無暇顧及製造官印，只是襲用遼、宋官印。太宗天會四年(1126年)，仿照遼、宋制度革新官制，始建三省之制。熙宗時期進行改制，『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為十九路』^⑥，所設的各級官府和官吏均授以禮部頒發的官印。根據官位的高低分金、玉、銀、銅不同的質地，皇帝、皇后、太子的璽印用金或用玉，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親王、尚書令之印均是金印，諸君王和正一品、從一品印為鍍金銀印，正二品、從二品官印採用鍍金銅印，三品以下的官印均採用銅質。

1966年元月，西安鐘鼓樓廣場施工時，在一枯井中清理出了金代官印279枚，均為銅質，從其內容來看，應屬三品以下的官署用印。

金代早、中期所頒造的官印均發自尚書禮部和少府監(內少府)，造型規整，質量較好。但到後期，由於北邊蒙古的南下威脅，南邊又有南宋的襲擾，國內又有各民族的起義抗爭，戰爭頻繁，政府腐敗，階級矛盾加劇，社會動蕩，官印頒造混亂不堪，中央到地方都可以頒造官印，西安鐘鼓樓廣場出土的官印就是這一時期頒造的。根據這批金代官印的內容及同時出土的銅版內容考證，這批官印是當時元軍南進，金朝乏力抵抗，兩行省弃京兆前投井掩埋所致。

一般來說金代官印尺寸越大職位越高，但這批官印尺寸明顯較大，就是同級官職的印面大小也明顯不同，

製作也比較粗糙，反映了當時官印的頒造機構比較混亂。這批官印經清理能釋讀的有『總領行尚書六部侍郎印』、『省差之印』、『陝西路總帥府知事印』、『經歷司印』、『南山一帶安撫使印』、『涇州之印』等。

『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蒙古人，不僅用鐵騎建立了元朝政權，而且用自己的聰明智慧創造了蒙古新字——八思巴文，並頒行天下。八思巴文是以藏文為母體，將藏文的音符文字形體加以變化，並吸收了九疊文的特點，再加之自製的藏文演繹而成的。

『蒙古軍都元帥府印』（圖486），銀質，柄鈕，邊長8.7×8.7厘米，1981年洛南縣出土。印文（八思巴文）排列規整，棱角分明，行與行之間分割明顯，印背左刻『中書禮部造，元貞元年六月日』，左刻『蒙古軍都元帥府之印』，背款均採用漢字鑿刻。八思巴文有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從左向右豎寫，字母和字母的連結也自上而下。

『元押』以其獨特的形式入印，並以自身獨有的『署押』功能，成為印史上一個特殊的現象。元押大致可分為花押、漢字押、圖像押及八思巴文押。

『押』，實質上是一種署書的樣式，是指在公文、契約上簽畫以特定的符號，用以防偽杜奸一種專門憑信。《宋史·職官志七》中載有：『凡批銷必親書押，不許用手記』的規定，這也說明押印在官方和民間都是通用的。早在漢代居延漢簡上就出現了『□月詬表押墨付如牒』押一『諾』字的署押。明朝李翊引《石林燕語》曰：『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花書即花押書字，宋歐陽修也有『俗以草書名為押字』的說唱。關於『花押』入印，明陶宗儀《南邨輟耕錄》中說：『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周廣順二年，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用印，據此則押字用印之始也。』

目前所見到最早的花押印是南宋末年周密所撰《癸辛雜識別集》中記載的宋十五朝禦押中宋太祖趙匡胤的玉押印。漢字押最早可追溯到戰國時期的『印陶』，陶工們在製作完成的陶器上鈐蓋上印戳，具有『物工勒名，以考其誠』的作用。

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後，漢楷作為漢族與少數民族交往常用的字體，必然受到蒙古上層貴族和下層平民的接受，而對於生活在本土的漢人亦無影響，因此，漢楷押印便成為元押中傳世最多、最有代表性的一種。在使用漢楷押印的同時，蒙古人也嘗試用自己發明的『新字』入印，這就是『八思巴文押。』（如圖1501、圖1504、圖1533）。當蒙古人與漢人之間不能達成共識的時候，他們便以圖像取代文字入印作為一種憑信來相互溝通，這就

是圖像押，圖像押的形制很多，鐘、鼎、壺、瓶、葫蘆、人物、動物等，五花八門。1989年在陝西長安縣出土了一枚『牛形押』（圖1653），印面鏤空，牛造型比例勻稱，印體較大，栩栩如生。

宋元以後文人流派印的興起，金石篆刻作爲一門藝術已與詩書畫并轡，代表明清璽印最高水準的官印，再也無力掀起印章藝術的波瀾。

1985年12月，在青海省西寧市的古墓中清理出土了一枚『凌江將軍章』，銅質龜鈕，邊長2.3×2.3厘米，屬十六國北朝之物。值得一提的是這枚印章帶有角質印匣，印匣根據印章的造型鏤空，底面直徑3.9厘米，最大直徑4.3厘米，頂部刻有龍虎圖形，腹部四面刻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圖案，頂部與下部一周都曾有梅花狀綠松石鑲嵌，放置龜首部位呈一斜向通洞與外壁相通。另見長安冀志軍先生收藏有一枚『佛法僧寶』銅印并帶有印匣，此印匣亦爲銅質，上大小呈斗形狀，未見有蓋，一側鑿刻有紀年邊款。

關於印匣與印匣文化的研究還需假以時日，只有從科學發現以及相關文獻資料中尋找端倪。

《鶴舫藏印》是民國長安印人鄭鶴舫先生收藏古璽印的圖譜，譜中所錄古璽印一百七十餘方，均係關中地區出土，這些印章現在分別被上海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天津藝術博物館和日本多處收藏。其中不少爲古璽印中的佼佼者，如：『泰倉』（圖010）、『敦浦』（圖011）、『琅左鹽丞』（圖014）、『浙江都水』（圖019）、『廣漢大將軍章』（圖226）、『設屏農尉章』（圖253）、『中私府長李封字君游』（圖416）等。

就陝西出土印章的流失情況傳嘉儀先生生前曾做過考查，其因有二：一是像民國時期的羅振玉這樣的大收藏家，曾流落日本，并把自己所收藏的七百二十方印全部賣給四國高松的大西行禮，再像陳介祺、吳雲、吳大澂等藏印家相繼辭世，日本人爭購中國文物蔚然成風，所以古璽印流入日本最多；其二，近幾年來陝西文物比較集中的地區，盜墓之風猖獗，所出古璽印被倒入外埠或海外。有聞一走私者，一次從陝北盜賣璽印五百餘方，數目之大，觸目驚心^⑩。近年來，筆者也多次走訪賈市之中，據不完全统计，每年非法流入西安古玩交易市場的古璽印不少於千枚。筆者曾見西安一藏家持白玉印一枚，印文曰『戰胡人』，西漢之物，覆斗鈕，邊長1.7×1.7厘米，『戰』、『胡』二字居右，占印面三分之二，『人』字居左通占印面三分之一，篆法極精，章法佈局自然得體，是爲漢印中的上品。此印『戰胡人』三個字，已將中原將士出征前的悲壯情景展現在我們眼前，試想這枚印的主人，在披甲上陣的時候，濁酒一杯，早已將兒女私情和自己的生死拋在腦後，爲了國家的安寧，與胡人決一死戰。睹物思義，我們不難想象漢人對『胡虜殲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熟』的盛世情思充滿了無限渴望。此印與西漢『王破胡』（圖936）、新莽『趙破胡之印』（圖1308）有異曲同工之妙。

陝西到底出土了多少印章，誰也難以統計。我作為文博工作者，多年來一直努力於陝西出土古代印章的整理與研究工作，爲了能對陝西出土古代璽印有一個見證，樂此不疲地奔走於各級博物館和收藏家之間，共得新出土古代璽印印蜕三千餘件，除去糟粕，從中遴選出一千七百餘方，分類編撰，結集成書，因其七八成以上未曾公開發表，故命名爲《陝西新出土古代璽印》。知耳目難周，疏謬難免，請專家學者指正！

2002年中秋於長安薦福寺

注釋：

- ① 羅紅俠、周小陸《試論周原遺址出土的西周璽印》，《文物》1996年12期。
- ② 《山海經·海外北經》。
- ③ 秦波《西漢皇后玉璽和甘露二年方銅爐的發現》，《文物》1973年5期。
- ④ 王人聰《新出土歷代璽印集釋》，香港中文大學文物報專刊之三1987年版。
- ⑤ 《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
- ⑥ 賈靖《張蘇印考》，《寶鷄文物》。
- ⑦ 《宋史》卷54《輿服志》。
- ⑧ 《金史·百官志》。
- ⑨ 《金史·百官志》。
- ⑩ 傅嘉儀《印道人印印》，《中國篆刻》1995年3月第1期。